

黄仁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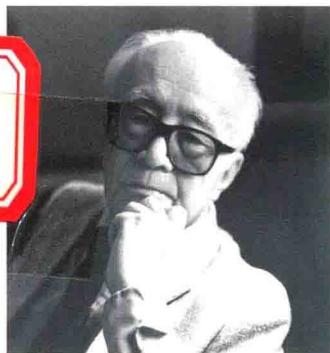
全集

Ray Huang

Works

黄仁宇 / 著

# 赫逊河畔 谈中国历史



Ray  
Huang

Talks on Chinese  
History by Hudson River

黄仁宇

全 集

Ray Huang

Works

#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

黄仁宇 / 著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/黄仁宇著. --北京:九州出版社, 2015. 9

(黄仁宇全集)

ISBN 978-7-5108-3939-9

I. ①赫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史评—古代—文集 IV. ①K2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2929号

##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

---

作 者 黄仁宇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黄宪华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7.125

字 数 180千字
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939-9

定 价 30.00元

---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## 出版说明

《黄仁宇全集》2007年由我社首次以平装16开本出版。

2012年,全集新增《长沙白茉莉》一书及初版未收入的十余篇文章,重新编校后,以精装16开本出版。

为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,现将2012年精装本进行重新排校和设计,以32开平装本的形式出版。

九州出版社

## 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》开场白

我住在纽普兹(New Paltz)的一个村庄里。这地方靠赫逊河(Hudson River)西岸不远,是纽约市及纽约州州会奥本尼(Albany)公路上的中心点。这村庄在一座小山之上,四境土地呈波状起伏。地质的主要构成因素是页岩。页岩也称泥板岩,原来是由泥土经过高度压力而成,状似灰黑色石块,只是质地脆弱,一碰就碎。它特别恼人的地方是到处都有,即使是挖一个阴沟,或是整理一处地基,也都会碰到它。1973年中东战事爆发,原油价格陡涨。美国又在前一年将小麦及玉蜀黍大量廉价卖给苏联,所以这时候自己供应不及,物价直线上升,甚至影响到面包、肉类、蔬菜的价格。我们靠薪水收入的家庭无一不受其苦,于是很多主妇都自行种菜。一时间每个家庭后面原先用来栽花草的空地,都成了菜圃。我们家也跟着照办。一年之内,我们吃了不少自己种的小白菜、丝瓜和西红柿。可是开掘泥土,要弯身用手铲,我和我太太的皮肤,都被这页岩割破,连种菜用的小刀、铁铲,也折损过半,花费时间不说,加上喷水除莠,及支付水费,还有种子、肥料、防虫剂的本钱,则所省也无几了。所以一到第二年市场供应情形好转,我们这自动下放做农民的兴致又直线下降。过了不久,村里人人掘土家

家种菜的风气也稍歇，一方面显示了一般美国人趋向时尚、见异思迁的习惯；另一方面也确是经济力量的驱使。合于利则行，不合于利则止，无从勉强。

但是纽普兹虽不是种蔬菜的地方，却是种苹果的好地方。可能因为此地的阳光水分温度，都和苹果相宜吧！而苹果树根也有能力透过页岩层吸收地下的水分及滋养。所以这村庄十里内外到处都是苹果树，成为本地最重要的资源。苹果树不能持久，几年之后，就得砍去，另种新苗，不管是砍伐树干，或是喷射防虫剂，都是打电话找专人来解决。所以种植苹果虽属农业，但却无异于商业经营。而最值得注意的是：一到收获的季节，即有承包商以巴士将摘苹果的劳工大批载来，男女老少都有，他们都是中南美洲人，操西班牙语，也只有工头才能带领他们。食宿问题，都自行解决，不惊动本地居民，并且来时即工作，苹果摘完装箱后全部员工即时离境，爽快利落。纽约的苹果，行销各州，也等于加州的橘柑、佛州的橙柚一样。因为交通便利，各超级市场又大批整买，统一倾销，所以各处价钱相差无几，我们就算近水楼台，也不一定能够廉买。

一个敏感的读者看到这里，就知道以上所说不仅是纽普兹和苹果树的情节，而是勾画着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样态和做事的程序。

我在这村庄内外散步的时候常常想起，要是在中国南方，纽普兹的土地必定也要大部开拓为水田。一方面要堵截山上的水源，一方面要汲引山谷下的水来灌溉低洼地带的田地。这页岩也只好一块一片地用手清除。这样，人民的生活怎能不艰难？用我们自己种菜的经验，也可以想象到中国农村经济情形的一般了。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及

早实行资本主义？

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。要用很多层次，才能解释得明白。

第一点，一个国家的历史，与它天候地理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加上很多事情时间上的汇合(timing)。中国因为天候地理的需要，初期统一，实行中央集权，政府扶植无数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，所以人口密度大，农业的特征是高度的精密耕作，主张各地自给自足，视粮食生产为主业，其他都为末业。从战国到汉初，这些条件还可以当作一时之策，但是经过两千年接续不断的维持，上述诸条件，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。不仅法律和家族制度支持这些经济条件，就连科举制度和社会习尚也都支持它。即使在明末清初，可能在中国发现一处像纽普兹的土地，也不一定能让它十里内外一体植苹果。即使种了也无人整批购买，无法集体采摘推销。我们还从各地方志上发现历史上有些“好官”，看到民间种植栗子、烟叶、棉花等商品农作物，竟命令立时拔去，改种稻粟，可见得这种历史上的大问题，牵涉到技术及思想者各居其半。这里面有很多根深柢固的因素。

美国开国之前，为英国的殖民地，纽约州在英国势力尚未巩固之前，尤其赫逊河畔一带，尚是荷兰人开拓的地方。这地方地广人稀，它的历史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：一、是土地所有权集中，后来经过无数分割买卖，才有今日的形势，但是农场和园圃，仍是以两三百英亩为单位，不像中国一亩两亩支离破碎（中国一亩约等于六分之一英亩）。二、纽约及新泽西州有些地方是清教徒移殖之地。纽普兹村庄则是十七世纪法国新教徒“休京拉”派(Huguenots)所草创，在政治经济的意义上讲，当日新教徒即已象征着一种反抗中央集权的趋向和运动，“休

京拉”派尤其尽瘁于各种新兴企业。所以这些立场,都和中国传统相反。美国大规模的内部改进(internal improvements)即是联邦以公款修筑公路发展交通通信事业,尚在19世纪初期,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展开并行,纽普兹的果园也在这时候创设,所以能利用这优势的环境。

但是以上是一个特殊例子。要整个检讨资本主义何以未能实用于中国,我们还要从这些背景因素之外,看清资本主义本身的特质。

严格言之,“资本主义”(capitalism)这一名词,至今没有公认的定义。亚当·斯密仅仅提出在增进人民的财富时,“商业的系统”优胜于农业的系统。马克思虽在著书时称“资本家”及“资本家时代”,也没有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。我倒觉得英国历史家克拉克(Sir George N.Clark)所说,最近性理。他说:“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,去概括现代经济制度,是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者所创行的办法。其所解说的一种社会形态,内中最有权威的乃是拥有资本的人。”

什么是现代经济制度?以纽普兹的情形为例,我们也可以看出其中三个基本条件:一是资金广泛的活用,如果我们彼此有剩余资金,必存集于银行。银行即将之挪借投资,此来彼往,资金永无休歇之日,有时出进之间,尚产生虚数,形成信用膨胀。二是产业所有人雇用经理,他营业的范围,超过本人及其家属足以监视的程度。三是属于服务性质的事业,有如交通、通信、保险等共通使用,用之商业活动之所及,又超过各企业自办自用的限度。这三个条件之所以能充分发挥,乃是商业信用(trust)业经展开;而信用则必须有法律在后面支持。倘不如此,谁敢把成千成万箱的苹果,凭一个电话的指示,运给几百里外的收货人?又有谁敢开银行,将存户的款项贷与果场的主人,让他去



安心经营,等他收获之后才算账还债,况且这果场主人的地产有一半还典押在债权人身上?

因为这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以上三个条件所造成,它必然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。西欧资本主义推行的时候,就需要由国家以商业性的法律,逐渐推行到全民。不仅遗传法、破产法需要符合商业社会习惯,甚且对监守自盗者的处置,虚枉欺骗者的惩罚,与强迫履行合同,都要能切实做到。因为这些法律同时也施行于商人集团之外,所以农业组织也要向商业作风看齐;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,即在西欧,因为这一套新制度与中世纪宗教思想和社会习惯大相径庭,所以也曾发生过无数的冲突。我们也可以说,很多趋向现代化的战争和革命,都与此问题有关。如果我们不用意识形态的字眼,单从技术角度检讨这段历史,也就可以说资本主义如能推行,社会里的各种经济因素(包括动产、不动产、劳动和服务)都要能彼此互相交换,私人财产也要有绝对的保障,然后这社会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(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)。再简洁言之,即全民生活,都听金钱制裁。国家订立财政税收金融政策,即已包括道德观念和社会习惯在内,在执行时,除非立法错误,不能临时在半途又撞出一个道德问题。这样才能符合韦伯(Max Weber)所说:“现代合理化的资本主义,不仅要有技术上生产的能力,而且还要有能让人预为筹算的法制,以及经理上正式的规则。”

西欧资本主义的最先进者是威尼斯。因为它是一个自由城市,处于一个海沼(lagoon)之中,受大陆的影响轻微,中世纪后,当地贵族都变成了重要绅商,或者受政府津贴。全民十万口左右,壮龄男子,都有服海军兵役的义务,陆军倒以雇佣兵(condottieri)为之。重要商业又系

国营,城中咸水又不便制造,于是尽力经商。虽匠役寡妇,也可以将蓄积加入股份(colleganza),水手也能带货。这样一来,一个国家就是一座城市,这一座城市又等于一个大公司。民法与商法,也区别至微。《莎氏乐府》里面的《威尼斯商人》称两造合同预订借债不还则割肉一磅作抵偿,到时法庭就准备照约施行,虽说是夸大讥讽,暗中却已表示威城以商业性的法律作主宰,信用必须竭力保障的背景,这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真髓。

16世纪之后,荷兰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。荷兰正式国名为“内德兰王国”(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)。荷兰不过是当日七个省中之一省,只是占全境人口三分之二,又负担全国经费四分之三,是商业财富的中心。内德兰经过几十年抵抗西班牙而独立之后,行联邦制,使经济发展前进的地区,照商业习惯管制,其他随现状改进,这样经过无数周折,而且荷兰的农业也重畜牧,不重谷物生产,与商业习惯接近,荷兰才能逐渐完成全国实行资本主义的体制。

继荷兰之后,英国成为杰出的资本主义国家。因为这国家农业基础强,它的“普通法”(common law)以农业习惯为基础,凡是以前没有做过的事统统不能做,所以相当保守。一到17世纪,世界局势变化,英国也迭遭折磨,经过英王与议会冲突、内战弑君、改为民国、行独裁制、复辟及第二次革命各种事迹。今日看来,其症结在经济因素互相交换的程度不够,不能全国在数目字上管理,所以才引起宗教信仰、王权与民权种种问题。1689年“光荣革命”成功以后,即无此趋向,因为几十年动乱之后,下层机构中的地产所有权,逐渐规律化,上层机构也承认“会议至上”(parliamentary supremacy)原则。而上下之间,也有普

通法逐渐容纳“公平法”(equity)的妥协方式,也就是一般与现代社会有关的问题,照商业习惯办理。这样一来,农业生产与商业交换并为一元,内地与滨海的距离缩短,一个国家可以像一个自由城市一样的简单紧凑,首尾相应;英国用这资本主义的组织做本钱,竟称雄于世界好几个世纪,进而逼迫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照样仿行,正如克拉克所说,让资本主义在社会形态中享有威权者;或者渗入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,相对的约束私人资本,成为社会主义。两者纵不相同,但在下述几点上是完全一样:法律须保障私人资产,鼓励资本流通,经理雇用、服务性质的机构共通使用,促成互相交换使得全国能在数目上管理。

1939年毛泽东说:“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,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,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,中国也将缓慢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。”这是一种没有历史根据的见解。资本主义除非确实的控制司法权和立法权,使政府尽其功能,支持商业信用,不可能说是已经在某一个国家立足。商品经济缺乏这种组织能力,也不能成为一种运动,亦即是无法孕育资本主义。称之为“萌芽”,实无意义。因为资本主义的形成要透过国家体制,又要社会全民支持,还常常影响到宗教和信仰,绝非“缓慢的”或者自然而然可以发育成长,前述三个例子以及其他尚没有提及的例子,除了威尼斯情形既简单又特殊外,其他无一不经过内外煎逼苦斗改革成功。就是连威尼斯也因为它我行我素的与教皇冲突,多次被开出教籍,并不是完全没有遭受险阻艰辛。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,几千年来重农抑商,所以改革尤难。

毛泽东称中国社会为“封建”,也待辨正。中国只有商周之间称得上是封建时期。明儒顾炎武说:“封建之废,自周衰之日,而不自于秦

也。”所以秦后统“郡县制”亦即是中央集权。中国古代封建,与欧洲中古之 feudal system 以及日本迄今近代的“幕藩”虽然时代差异,组织结构不同,但基本也有若干相似之点。此即是地方分权,倚赖军事系统作它自身的体制,爵位世袭,掌管封邑的贵族,不放弃土地所有权,既为地方首长,也是大地主。这与明清之中央集权,地方官由中枢派遣,重文轻武,土地零星分割,自由买卖,社会流动性大的情形可说正好完全相反。很多人之所以坚持中国近代仍为封建,一方面固然是便于因袭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历史公式,另一方面是认为封建代表着落后,而中国不管是周衰也好,明清也好,总是不合时代,所以用不着仔细计较。

殊不知中国近代的官僚政治 (bureaucratism),表面上要较封建或日本的幕藩时髦得多,明清尤其是如此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,照各地“大名政权”(即分藩的各诸侯)的办法抽收近百分之五十的田赋。新政府也发行钞票及公债,筹办实业,扶植私人资本,具有资本主义的色彩。但是维新后二十年,田赋所得仍占政府收入之最大宗,也就是说新政府能利用农产支持它的改革。中国的田赋,迄至清末,每年有三千三百万两的收入底账,但实际上收入零碎,人民摊派或有余,而入库则不足。即算是三千三百万两,以总数二千县计,平均每县不过一万六千五百两。县长的薪水通常接近二千两,其他薪给贲付上级衙门公费等,也只能维持旧形式的官僚政治。民国成立以来,田赋始终未对中央财政发生作用,政府缺乏适当的收入,为政局不稳的最大主因。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农业国家,竟不能从农业上获得适当的收入,实为世界历史所罕见。这种现象不能以“封建制度”这个名不副实的名词去冒充解答。况且依据各处方志所载土地分割使用,零星杂

碎,历史家更不应以“膏腴万顷”、“田连郡县”等等土地集中的假历史资料去搪塞(要是真的土地集中到这程度,问题就容易解决了)。

可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已在1986年岁暮,上面所叙各种情节,大部分已像雨过天青般,随着过去的雷霆霹雳一扫而光了。读者只要闭着眼睛一想,中国在1980年代一定和1920年代有一个很大的差别。这差别的重点,即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(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)。

如用另一种方法来解释:中国全面与列强冲突,始自鸦片战争。战事始于1840年,距今一百四十七年,快要到一个半世纪。要是我们拿着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分成无数细微末节,凭着片面的见解去分析,读来一定令人切手蹙额,总离不开愚人蛮汉做坏事的观感。可是把这一百多年来的事迹前后连贯起来综合检讨,则所得的印象,又会截然不同。好多事情,很像是接二连三的失败,但是实际上失败之后,中国国家与社会却又成梯度式的前进。这一百四十七年来最大的一个进步,即是当初中国完全不能从数目字上管理,皇帝也不知道和英国开战要用多少兵,人员如何调度,要用多少饷,钱粮如何筹措,到今日中国仍不能说是凡事即能有效的合理处置,但是至少已开始数目字上管理。

现代战事及群众运动,要动员很多的因素。这全面动员之后,当初很多不平衡的地方,会因事势上的需要,趋向平衡。很多以前被掩饰的弱点会因之暴露。被阻隔的地方,因之而疏通。其程序有时尚出领导人物意料之外。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,可以说是大日耳曼主义和大斯拉夫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冲突。可是终战之日,德奥既

败,沙俄也败,需要善后的时候,几乎与当初威廉第二及尼古拉第二动员宣战的宗旨毫不相干。这主要是因为专制皇权(autocracy)跨地过广,组织不符时望,所以统被清算。第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时,乃因希特勒要提倡他的人种优秀说,他还一定要替日耳曼民族,在东欧开辟一个“生存空间”(lebensraum)。可是这运动一失败,不仅纳粹人种优秀说瓦解,而且全人类平等成为此后世界公认原则,连那些没有被战祸波及的地方,也一体通行,殖民地全要铲除,不仅为希特勒想象之不及,也非张伯伦、丘吉尔所能预料。

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,超过单纯的国际战争。但是历史上的大问题几经波折之后,要在实际的条件下找到适当的解决,则彼此都是一样的。近数世纪以来,世界上一般的趋势,是交通发达,技术进步;这潮流强迫闭关自守的国家门户开放,以农业组织作基干的旧社会实行改组,开始商业化。随着资金流通,经理雇用,服务性质的机构共通使用的原则,每一个国家才能将它内部公私的利益融合为一元。这种商业化的组织,随着生产进步,越扩越大,也绝不是坚持农业习惯,以狭义的平等的原则,作一成不变的组织所能阻挡。纵是后者能使其国民衣食无缺,其人民也不甘心在技术拙劣人文因素简单的条件下过日子。

我已经说过,一定要澄清今日中国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,已无意义。孙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著书,就说及中国一方面固然要节制私人资本,一方面仍要扶植私人资本。因为这六十多年来中外的距离越来越大,今日的中国尤其应该扶持私人资本。即使以国家资本开拓庞大的企业,也仍不能缺少民间企业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

持。要加强其支持,则必须保障私人财产,使一切能在数目字上管理。这程序已由事实证明,不容任何意识形态加以否定。这也就是前述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一部分。

针对以上的情形讲中国历史,应当重新订正。

历史上的真人实事,是不会变化的(除非过去传闻错误,可能因新证据发现而修改)。但是资料的取舍,因果关系的布置,随作史者及读史者的立场而转移。著名的经济学史家熊彼德(Joseph Schumpeter)说过,历史家铺陈往事,最重要的任务,是把今人的立场解释得合理化。现在中国既然是雨过天青,假使作史者和我们一样相信今后国家的策略是将全面组织商业化,以便一切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,而所写历史却又离不开阶级斗争的立场,视资本主义为畏途,企图保持某种意识形态上的“纯洁”,那也就是自我作对了。

况且中国的历史,过去以传统官僚政治的目光进行编撰。我写的一本《万历十五年》已经揭载着这种立场的特征。总之,传统中国在技术尚未展开之前,因迫于环境,首先就实行了中央集权,因此下面的统计无法着实,各地区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全盘检讨,只好先造成一个理想的公式,笼罩在这亿万军民和犬牙相错的疆域上,所以真理总是出自上端,皇帝的面目为“天颜”,他的指示即是“圣旨”,丝毫不容辩白。官僚集团只要能维持他们彼此间互相承认的逻辑,对实情不一定要认真负责。道德既可以替代法律,礼仪也可以装饰行政。在这种情形之下,其所标榜的道德,也就浮泛而不着实际。用这种态度去修撰历史,我们今日无法全部因袭。

我认为,中国虽和西洋文化摩擦接触达百余年,直到最近才完成

了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条件,自此中国历史,才正式与西洋文化汇合。在这关头重订历史,首先就要把丛错的事迹,针对今日着眼,并且追根究底,回溯到公元以前初期统一的原因,加入中世纪以后国家愈注重于内向(introvertive)及非竞争性(non-competitive)的端倪,又牵引到鸦片战争后想要改造的艰难,最后才归结到今日。这样草拟的历史,属于“大历史”(macro history)的范畴。作者不斤斤计较于所述人物当时的贤愚得失,而只注意他们的作为,透过中国法制与社会,遗留给后代的影响。虽然叙述中尽量提及“负面因素”(negative elements),然而等全部叙述完毕后,我们如果再回顾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,一定会叹赏中国人所创造的这一个政治经济系统之庞大。而且虽说改造艰难,却又在艰苦困难之中完成了改造的使命。这在世界历史中算是首一无二的事,古代文明之中,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或社会可以望其项背。我们根据全部事迹去赞扬中国文物的伟大,岂不要比掩错饰过、颠倒是非的赞扬要来得真切而畅快?写历史的人实应采取这种观点。

然而以我一人之力,会有能力修订中国两三千年的历史?我现在说的修订并不是研磋考证,而是将现有史料,重新安排,注入新的眼光,做这样的工作需要的不是才华,而是视界。因为我年轻的时候,在国军当过下级军官十多年,亲身经历内地乡村的情形,也知道“壮士军前半死生”,实际是怎么一回事。以后又游历各地,凡本文提到的地方,或曾久居或曾暂住,总经耳闻目睹。最近几年,自己更亲临到被裁失业的危机,所以现在写历史,已经有了文题内外的生活作陪衬。凡所叙群众运动,饰过掩错,雨过天青,经济力量驱使等等情节无一托之



空言。至于书面上的知识,却只占准备的一部分。

这段“开场白”就此停笔,下文不久即见分晓。

原载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》(台北:时报文化,1989)